



编者按:就在外界纷纷认为联合国2011气候变化德班(南非)会议(简称德班会议)将无果而终时,一天一夜的“加时赛”突然峰回路转。虽然由于发达国家缺乏政治诚意,“巴

厘路线图”谈判仍未完成,不过,各方对此次会议的结果普遍感到满意。

45%的碳强度减排,是中国对国际社会做出的一个郑重

承诺。利用金融市场上碳配额的价格信号,可以让国际社会更直观地了解中国在平衡发展经济和控制温室气体排放方面所做的工作,但是,中国的碳交易市场,还在摸索阶段。



德班会议：一场关于承诺的较量

■ 本报记者 邢宇

原定於12月9日结束的德班会议推迟整整两天才落下帷幕。当地时间11日凌晨5点,来自约200多个国家和机构的代表经过一天一夜的艰难磋商后走出会场,倦意写在每个人的脸上。对于中国代表团团长、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解振华来说,刚刚打完一场硬仗,更多的是一种满足和兴奋。

在德班会议的全体大会上,解振华在发言时高声怒斥一些发达国家拒不履行承诺、反而向发展中国家施压的做法,赢得了很多与会代表的鼓掌喝彩。他说:“一些国家,我们不是看你做什么,我们是在看你做什么。一些国家已经做出承诺,但并没有落实承诺,并没有兑现承诺,并没有采取真正的行动。”

说到这里,解振华的声调逐步提高,接连发出质问。他说:“讲大幅度率先减排,减了吗?要对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你提供了吗?讲了20年到现在并没有兑现。我们是发展中国家,我们要发展,我们要消除贫困,我们要保护环境,该做的我们都做了,我们已经做的,你们还没有做到,你有什么资格在这里讲这些道理给我?”

德班会议,在这声声质问中,迎来了转折性的突破。

最后的拯救

在今年的德班会议期间,各方关于气候变化的博弈日趋激烈。欧盟、“伞形集团”(包括美国、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基础四

国”(指中国、印度、巴西、南非四国)、“77国集团”、小海岛国家以及最贫穷国家等从不同的立场出发,都阐述了各自观点。经过3次预备会议后,各方在《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等关键性问题上分歧依然严重,尤其是日本、加拿大、俄罗斯表示不准备续签《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降低了人们对德班会议的期待,为会议蒙上了阴影。

各国人士纷纷对此次会议结果做出预测,但大都持积极态度。原因很简单,在金融危机阴霾尚未消退,欧债危机愈演愈烈的今天,发达国家明显表示“很差钱”,谁还有精力兼顾《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并为此埋单?唱衰会议成果也在情理之中。

在一片“嘘”声中,大会进入了“加时赛”,并在这一天多的时间里,上演了一出绝地反击、拯救地球的戏码。经过激烈谈判,各国代表终于在最后时刻推出4份决议,分别涉及《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长期合作行动计划、绿色气候基金和2020年后减排的安排,并体现了发展中国家的两个根本诉求:发达国家在《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进一步减排;启动绿色气候基金。

环境保护部气候变化与环境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刘兰翠表示,德班会议最重要的意义体现在最后时刻挽救了《京都议定书》,避免了发达国家提出的开辟另外一套减排模式的发生,保证了未来的气候谈判仍将按照《京都议定书》规定的发达国家绝对量减排的模式来进行,为未来,尤其是2012年气候谈判开了个好头,释放出

了积极的信号。

折中的结果

但实际上,德班会议的结果是个“大家都不同意,但都可以接受”的结果。欧盟得到了由自身推动的全球减排新协议谈判的开始,发展中国家保住了要求发达国家承诺《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和绿色气候的资金支持,而美国得到了一个事实上没有时间限制的成果。

欧盟从谈判一开始就提出了所谓的“路线图”计划,提出有条件签署《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要求在2015年前制定涵盖各主要经济体的新法律框架,并于2020年实施。

根据《坎昆协议》,发达国家应该在2010年至2012年为发展中国家提供300亿美元的绿色气候基金;在2012年至2020年,每年提供1000亿美元支持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

然而,坎昆会议至今,发达国家兑现承诺的速度着实让人光火。这就引出了解振华在最后一次全体大会上做即席发言时怒斥发达国家的一幕。

对此,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的态度虽没有那么激烈,但他也不断呼吁发达国家,敦促其加大捐款力度,以免这项全球性气候变化基金成为一个“空壳”。

终于,经过一番唇枪舌剑的较量,绿色气候基金有了着落。一些国家已经表示愿意为该基金的启动提供资金,德国和丹麦分别注资4000万欧元和1500万欧元作为其运营经费和首笔资助资金。基金有望在2012年完成相关工作,并

帮助发展中国家准备好使用基金,促进发展中国家建立本国的清洁能源蓝图,适应气候变化。

“中国角”发声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总部环境与能源组主任维拉·万德韦德(Veerle Vandeweerd)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国决心要发展低碳经济是颇有抱负的,也是迄今为止发展中国家里面在紧密结合气候变化和自身发展问题上表态最明确的国家。

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华代表处提供的一份资料显示,中国“十二五”规划在环境保护、能源利用和气候变化等方面采取了比往年更强有力的措施,有望继续在减少化石能源消费、推进低碳经济发展、鼓励建立环境友好型经济模式上取得重要进展。中国政府重视建立与完善国内碳排放交易市场机制,为有意于进行碳排放交易试点的地区提供支持。另外,民生议题如发展不均衡和社会不公也成为规划纲要关注的问题。

“中国已经在通过政策和管理框架的制定来采取一些应对气候变化以及发展绿色经济的行动。”万德韦德女士赞赏地说。

据悉,在德班会议第二周,中国方面即释放出中国可以考虑接受2020年后全球减排新协议的信号,给原本艰难的气候谈判带来了继续推进的契机。另外,在德班气候大会“中国角”边会上,中国已经正式成立了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和国际合作中心,帮助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的进程中发挥越来越关键性的作用。

无米下锅 碳交易市场难成炊

■ 本报记者 高洪艳

“碳市场建立要花十多年,但毁掉它只是朝夕之事,我们期盼德班会议各方能为此释放积极信号,即便《京都议定书》难以为继,也要做好碳交易市场的‘善后’安排。”德班会议召开前夕,担任过国家发改委清洁发展机制项目审核理事会专家的唐人虎抛出“善后”一说,让如火如荼的中国碳交易市场上的各方屏住了呼吸。

伴随着德班会议落下帷幕,国内诸多即将上马或者已经上马碳交易项目的产权交易中心长舒了一口气——幸亏《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将在2013年生效,否则,继续谈碳交易就会是一个笑话。

然而,碳交易的春天,已经来临了吗?

摸索阶段

著名经济学家、金融信托基金专家、投资银行家孙飞博士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指出,由于碳交易的特殊性,碳市场的全面建立将是一个跌宕起伏而又循序渐进的过程。目前,虽然全国各地在碳交易技术路径、交易模式等方面进行了一些探索,但是,总的来说,碳交易在中国的发展还很不成熟,国际上对该领域也一直处于摸索阶段。

摸索过程不断出现意外和曲折。据外媒报道,由于缺乏法律依据和经济效益,全球第一个碳排放交易市场芝加哥气候交易所将在今年年底前关闭碳交易

市场。分析人士指出,美国气候法案在参议院闯关未果后,北美的碳排放交易已经形同虚设。

“关于碳减排和碳交易问题,国内和国际上一直未能出台有共识的量化指标和体系规范。”孙飞说。

据记者了解,虽然近两年碳交易概念很火,各地也陆续成立了大大小小的碳产权交易中心,但是,直到目前,国内还没有明确的减排配额体系。

“没有强制的碳排放额度,碳交易是难以做起来的。”重庆低碳研究中心负责人袁康表示,现在亟需国家确定各地的能源消费总量目标,有了这个数字就可以测算总的碳排放量,再分解到每个单位和企业,超过排放额的需要购买额度,这样,碳排放交易才能做起来。

冰点交易

碳交易的先行试水者,一直都在“摸着石头过河”。在国务院近期部署的对各类交易场所的清理整顿工作中,碳交易所暴露出的交易量冰点问题触目惊心。据媒体披露,北京、天津、上海三大碳排放交易所成立至今,没有一桩交易完成,前景堪忧。

记者了解到,实际上,也只是在今年11月份,国家发改委办公厅才刚刚下发了《关于开展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工作的通知》,批准北京、天津、上海、重庆4大直辖市,外加湖北(武汉)、广东(广州)、深圳等7省市,开展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工作。但是,在国家发改委此番公布7个试点之前,贵阳、厦门、杭州、辽宁、河

北、山东等很多省市就已经纷纷抢滩,成立了各自的碳排放交易所或者能源环境交易所,绝大部分都新增了碳排放交易的内容。

据不完全统计,中国目前正在筹建的碳交易所已经多达100多家。

孙飞告诉记者:“碳交易所的成立,曾一度被认为是中国节能减排事业的一个里程碑。然而,由于目前国内尚未赋予碳排放权商品属性,也没有形成碳排放权的分配机制,从实际效果来看,碳交易所大多并无实质性业务。”

据悉,目前,国内碳交易的方式主要有两种:一是和发达国家间的清洁发展机制项目(CDM);二是国内企业的自愿减排项目(VER),就是一些机构或个人出于企业形象或社会责任的考虑,购买一些指标来抵消日常经营和活动中的碳排放。业内人士坦言,由于没有强制性,此项业务量“微不足道”。

对此,财政部中国清洁发展机制基金管理中心一位资深专家的解释是,对于碳交易,企业缺乏动力,市场缺乏需求。一位参与制订《“十二五”国家温室气体排放控制综合方案》的碳减排战略专家更是直言:“没有马就备鞍,没有米就上炊,觉得占了个坑,就一定有市场,这是典型的计划经济思维。”

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能源环境与气候变化研究中心主任徐华清也指出,中国目前还是以单位GDP排放的强度为目标的,因此,在“十二五”末建立全国性的碳排放交易市场的可能性还不小,比较乐观

的估计应该是在2025年左右。

趋势诱惑

以此推算,中国出现“碳交易热”足足超前了十几年。对于这股热潮提前来袭,孙飞认为,这完全是出于“趋势的诱惑”。

“节能减排的行政指令下,地方政府表示压力很大,所以,有时不得不选择建立碳交易所来表明一种在节能减排方面已经有所作为的姿态,所以,很多地方筹建的碳交易所,已经多半成为了政绩工程。”孙飞说。

曾经担任北京环境交易所副总经理的王毅刚还指出,国内纷纷上马碳交易所的热情,源于两股冲动的一拍即合——地方政府成为碳金融中心的冲动和各地产权交易所寻找方向和出路的冲动。

但实际上,碳排放交易中蕴藏的巨大潜力应该成为未来中国碳交易市场发展的动力。

洲际交易所集团旗下的子公司欧洲气候交易所是全球最大的碳交易所,洲际交易所集团董事长黄杰夫指出,由于中国制定了到2020年减排45%的碳强度指标,工业企业的碳排放事实上已经开始出现稀缺性,有了稀缺性,从金融经济的角度就可以开展交易了。中国每年二氧化碳排放量为60亿吨左右,是欧洲22亿吨的近3倍,而欧洲气候交易所每年的交易规模达到上千亿美元。由此可见,如果在中国建立一个碳交易所,潜在的交易规模将是巨大的。